

上海方言音变中社会认同的作用

Guo-qiang Liu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rough reporting a study on a sound change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the issue of social identity promoting language change. It will show that social identification by young people with a formerly undesirable variant soun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was pivotal in pushing this sound variation into a sound change.

一、引言

语言变化起始于语言变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变异就是语言变化的一个先决条件。不过，并非所有语言变异都会演变成语言变化。语言变异是由什么引起的？为什么有的语言变异后来演变成了语言变化，而有的语言变异却稳定下来，最终成了长期的语言变体现象？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某个语言变异发展成语言变化的？研究结果发现，语言变化一方面是由语言内部的力量所推动的，另一方面社会动力也对语言变化产生了影响（Aitchison 2001；

Chambers 2001)。

本文报告的研究案例涉及上海方言中一个语言变化。我将试图从社会的视角来探讨该语言变化，特别是要讨论语言接触和社会认同促成该语言变化的问题。本文在此提出两个问题：（1）语言接触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发语言变异？（2）社会认同在把语言变异推向语言变化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通过报告对上海方言中“我”字发音变化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在最初的语言接触和其所导致的语言变化方面深入探究与社会认同相关的一些因素在促成这一语言变化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语言接触的社会场合、各年龄段的身份认同、对使用发音新变体与年龄段身份认同之间的看法、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因素。

语言特征承载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形象并反映使用某种语言特征的人的社会地位。一种语言或方言与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接触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这种语言或方言会使用另一语言或方言的特征。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某个特征若要被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所采用，它就必须被那种语言或方言的言语社区中的人所接受。这其中涉及该言语社区怎样看待这一新的语言特征。本文将试图论证社会认同是上海方言中“我”字新发音被融入上海方言的一个触发因素，因为上海方言言语社区对这一新的语言特征持有正面的态度，并正面认同这一新的语言特征所产生的社会形象。再者，一个语言变异现象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推动才能演变成语言变化，否则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语言变体。本文显示，社会认同在促进上海方言中“我”字发音变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当该词的新发音得到了上海方言言语社区在

社会层面上的接受并从年轻人向岁数较大的年龄段蔓延后，它就演变成了一种语言变化，对上海方言的语音体系产生了影响。本文由此认为社会认同在推动语言接触转变成语言变异中，在将语言变异继而推向语言变化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研究社会认同与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关系，为的是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解释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社会认同是指人们属于哪种呈现社会人口特征的人群，比如所属年龄段、职业、社会经济层次、教育层次、语言或方言背景等等（Milroy 2002）。从另一层面来说，社会认同还指某个人怎样确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即此人与什么人认同。无论在哪个层面，社会认同在人们使用的语言中都会有所反映（Tajfel 1982；Turner, Hogg [et al.] 1987）。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对上海方言中的一个发音变化来探究社会认同在触发语言使用中的变异和促成这种语言变化所起的作用。首先，我将概述上海方言中“我”字发音变化；然后我将简单叙述语言变化的重要外部或社会因素和语言变化的重要内部或语言因素。最后，我将陈述并分析数据，讨论社会认同怎样影响这一发音变化。

二、上海方言中的一个音变

在其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中，上海一直是一座移民城市。在前一百年中，百分之八十的上海人口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起，上海经历了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又一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移民。在2006年底，上海永久居民人口为一千八百十五万，其中四百六十七万是移

民，占上海人口的26%（上海市统计局，2007年）。此外，上海还有数百万生活和工作在该城市的非永久居民人口。

因此，上海市区人口使用的上海方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所使用的方言之间一直有接触。近几十年来，上海方言还受到了中国官方方言普通话的很大压力。由于这些原因，上海方言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正如钱乃荣所注意到的，上海这个城市在经历重大的经济和文化变化的同时，上海方言也发生了快速和巨大的变化。这些重大变化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方言中元音和复合元音的数量下降。1853年上海方言中有六十三个元音和复合元音，而到了2003年时只存在三十二个（钱乃荣，2003年）。从这点上来说，上海方言为语言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

上海方言中语言变化的一个实例是“我”的一字发音。“我”一般发作 [ŋu:]，而且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仍然发此音。不过此词还被发成 [u:]，发此音的一般为年轻人。二十多岁的人几乎全发 [u:] 音，二十岁以下的人更是如此。该词发音的这种变体在过去曾被看作“外地人”学上海话的非标准发音，而且发此非标准音的人常常会受到歧视（上海人以前常被指“严重排外”）。但是，这种发音近年来已被年轻的上海人采用。新发音 [u:] 正在取代原有的发音 [ŋu:]，因此这可被认作上海方言中的一个语言变化（Liu 2007）。

本文行至此处显现一个问题，即以前曾被看作地位低下的非本地发音变体 [u:] 怎么会被上海居民接受，继而又被融入本地方言中并正在取代原有的发音 [ŋu:]？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语言变化一般是怎样发生的。

三、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和语言内部发展导致的变化

语言和方言始终处于变化的压力之下，其中有语言或方言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压力。从外部压力来讲，一种语言如果与其他语言或方言接触，会导致其他语言或方言的特征引入这种语言或方言，这种引入可能继而使受方语言或方言发生变化。从内部压力来讲，语言本身就是“生命体”，在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说和写的使用及听和读的理解中，语言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地进行语言形式的重组，其中包括语音体系、语法体系和功能运用等的重组。

在这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接触对于世界人口中很大比例的人来说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通过移民，比如通过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正如Thomason所观察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语言变化的原因可归于语言接触（Thomason 2003）。语言接触以多种方式引起受方语言的变化。它可能导致受方语言体系失去一些特征；它可能将一些新特征加入受方语言体系；它也可能致使受方语言体系中一些原有特征被新特征所取代。

由语言接触引起的最常见变化是词汇借用。当一种新物品或一个新概念从另一语言被引进时，如果受方语言没有相应的词来表示这一物品或表达这一概念，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这一物品或概念的词汇就是很自然的事。现代汉语中含有许多从其他语言借用的词汇，特别是从英语和日语借用的词汇。从英

语借用的词汇包括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沙发（sofa）、逻辑（logic）等等；从日语借用的词汇包括服务、干部、健康、俱乐部等等。

语法的直接借用现象也存在，但远远不如词汇借用那么广泛。语法借用的一个例子是东南亚华语和台湾的国语中使用英语完成时态，比如：

—这部电影你看过了吗？
—我有看过。

这种用法近年来也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中间流行开来。

在把一个新的语言特征引入受方语言中，引入者是否能够标准地说供方语言对由此引起的语言变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语言接触引入新的语言特征中，如果一种语言的母语者引入另一种语言的特征，最初借用的一般是非基本词汇；如果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接触保持下去，随后借用的会是语法结构特征，最后再借用另一语言的基本词汇（Comrie 1981; Moravcsik 1978; Thomason & Kaufman 1988）。反之，如果一种语言的学习者在不能标准、流利地讲这种语言的时候把这种语言的一些特征引入自己的母语，最先引入的语言特征一般为语音和句法方面的特征，而不是词汇。只有在他们认为讲另一种语言的人地位更高时，他们才会引入那一种语言的词汇。从这点上来说，语言接触引起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变化可通过引入者是不是母语者来区别，即受方语言借用与供方语言强加之间的区别（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 van Coetsem 1988）。

除了语言接触等外部对语言变化的压力之外，语言还处于内部系统不断优化的压力之下。Aitchison (2001:153) 概述道，这个优化过程通常涉及语言的简化和经济化；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就是由人的惰性而推动的。英语中 *Saturday*（星期六）一词的发音就是简化和经济化的一个例证。在英语的一些方言中，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词说成 *Satday*，省略掉了其中的一个音节。英语中的另一个例子是 *particularly*，它已被简化成 *particuly*，也省略掉了其中的一个音节。

在语音层面上，语言优化反映在发音简便的趋向上。长期以来有这么一种看法，即人在讲话时总是想以最简便的方式发音，而这是推动语言变化的一种力量。这种优化的一个结果是省略词尾的辅音，因为发出词尾的辅音并不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汉语中也有这类变化，比如韵母 [an] 的发音中的 [a] 就被鼻音化，而该韵母尾的鼻音 [n] 却被省略（Chen & Wang 1975）。在汉语的各方言中，粤语所保留的古汉语特征数量最多，因此也最接近古汉语，其中一个古汉语的特征是词尾的声门塞音。相比之下，普通话简化掉了这种发音，现在已完全没有词尾的声门塞音。

不过，合理化并不意味着语言会向最合理的体系这个目标进化。世界上每个事物都有其制衡因素。说话者一般都想很轻松、简便地发音、说话；就这点来说，它的制衡因素就是听话者都想清晰地听到说话者所说的话。在交流中，说话者需要被听话者听到、听懂，这样才能满足说话者的交流需求；正是这点限制了说话者轻松、简便地发音、说话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互相竞争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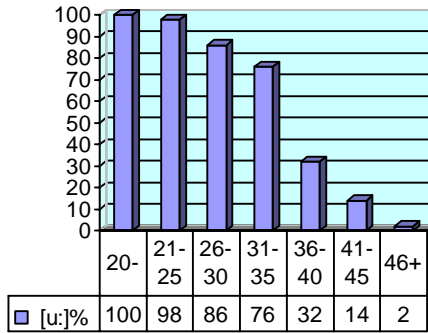
(Newmeyer 2003: 29) 在起作用；两者之间针锋相对，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推进，结果形成类似“拔河比赛”的一种胶着状态，从而保持语言的相对稳定。但是，这种平衡的状况可被外部的动力所打破，引起语言体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体系又是“固有地不稳定”（Croft 1995: 524）。语言之间的接触就是这种外部动力的一种，它可能打破这种语言平衡状态，触发语言变化。

四、数据

直到十多年以前，“我”字在上海方言中的发音还一直是 [ŋu:]。钱乃荣在《上海语言发展史》(2003) 中引述了199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其中“我”字的发音仍是[ŋu:]。但是近年来，以前曾被认作非本地人的不标准发音 [u:] 已被本地人接受，成了上海方言中“我”字的发音变体并逐步演变成上海方言中的一个新发音。

本文的数据采自2003年11月至2006年11月之间开展的一项“田野”调查。访谈对象为说本地方言且在上海居住两代以上的上海当地居民。受访者分成七个年龄段，即20岁以下、21-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及46岁以上，每个年龄段有50名受调查对象。以下是调查中所得到的与本文相关的一些数据。

表 1: 在自然语境中发音为 [u:] 的比例



如上图所示，受访者中年龄越小，发音为 [u:] 的可能就越大。受访者如果超过45岁就不会发 [u:] 音，而20岁以下和21-25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几乎全部发 [u:] 音。受访者中26-45岁年龄段可被看作从 [ɲu:] 的发音到 [u:] 的发音的过渡年龄段。41-45岁年龄段中仅有14%的受访者发 [u:] 音，而26-30年龄段中却有86%的人发此音，表明这个年龄段基本上完成了过渡。31-35岁和36-40岁这两个年龄段似乎可被视为上海方言中“我”字新与老发音的分界线或过渡年龄段。

语言变异起于年轻人，而语言变化其实就是年轻人创新使用语言的结果；上海方言中“我”字新发音 [u:] 的案例就是这一点的旁证。研究结果证明，就一个人的语言发展过程来看，20岁以前其语言发展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Labov 1994、Cukor-Avila 2000）。很大比例的年轻人使用 [u:] 的发音这点显示，随着上海方言使用者中年龄较大的人逐渐消失，现在年轻人所使用的发音 [u:] 将取代原来的发音 [ɲu:]，[u:] 也将由一种语言变异中的变体转成发音变化并在上海方言中稳定下来。

表 2： 20 岁以下和 21-25 岁年龄段所认同的社会网络

朋友	100	(100%)
年龄相似的同事	100	(100%)
年龄较大的同事	23	(23%)
年龄相似的邻居	100	(100%)
年龄较大的邻居	57	(57%)
父母	18	(18%)

表2显示了20岁以下和21-25岁年龄段受访者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各类人所认同的不同程度。在访谈中，我向受访者提起他们的社会网络中的五组人，然后让他们说他们与这五组中的哪些人认同。在语言使用上来说，这种认同是指愿意与交谈者说“相同的语言”，也就是使用相同的语言特征。如同表2显示，20岁以下和21-25岁的年轻人完全与朋友及年龄相仿的朋友、邻居认同。反之，受访者中愿意与年龄较大的同事或自己的父母认同的人不多。仅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使用与年龄较大的同事相似的语言特征，仅18%的受访者说他们会使用与父母相似的语言特征。有意思的是，相当高比例的受访者（57%）却似乎也愿意与年龄较大的邻居认同。

表 3： 20 岁以下和 21-25 岁受访者中不会发 [ŋu:] 音的人的住房种类

与邻居保持交往的老式住房	0	(0%)
与邻居无交往的新式住房	26	(100%)

表3显示了受访者与邻居保持交往的程度。在受访的20岁以下和21-25岁两个年龄组中，有些人能够发“我”字原有的音 [ŋu:]，虽然他们在一般场合说上海话时都发新音 [u:]。但是，这两个年龄组中的还有一些人不会发 [ŋu:] 这个音，就是让他们试着发这个音也不行。如表3所示，26位不会发 [ŋu:] 这个音的人都住在新式住房中。据这些人说，他们所住的新式住房中邻居之间没有来往，因此一般也没有语言上的交流。这些人中无人住在老式住房中，而在老式住房中，邻居之间一般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往来。

五、讨论

上海方言中“我”字的原有发音 [ŋu:] 对于非上海本地人来说很难学，因为这个音不存在于汉语的其他大多数方言中。与原有的发音 [ŋu:] 相比，上海方言中“我”字新音 [u:] 的发音要容易得多，人们一般都能很轻易地发出这个音。从这点看来，上海方言中采用新发音 [u:] 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个音先见于非土生土长的新上海人口所用的上海方言中，是这些人的母语方言与上海方言接触的结果，也是语言简化的一个自然结果。不过在这种语言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层面上身份认同这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这一语言变化。

首先，上海方言中“我”字的新发音 [u:] 作为非本地人使用的一种发音变体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它一度曾被看作非上海本地人身份在语言上的标记，也是被认为一种负面的语言特征，使用这种语言特征的人会受到上海本地人的歧视。换言

之，这一新发音是上海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相接触的产物，但是起初它没有得到上海本地人口的接受或认可。我们可以将上海本地人过去对这种语言变体的不采纳归于身份认同问题；更加精确地说，这是一种不认同，也就是对使用这一受歧视的发音的人缺乏身份认同。

再者，上海方言中“我”字的新发音是原有发音简化的当然结果。两者的韵母相同，被简化掉的只是声母中的鼻音，而此音为上海方言所特有，也是讲其他方言者在学讲上海方言中难以掌握的一个音。新发音与原有发音相比容易得多，另一方面也不会引起被误听成另一词的现象。不过，虽然新发音早就存在，但这一简化过程直至最近才开始，而促成这一过程的是年纪轻、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上海新移民开始被本地年轻人所接受、所认同，而且本地年轻人也开始使用这一新发音。

身份认同对年轻的上海本地人与上海方言中“我”字原有发音的接触或缺乏接触也产生了影响。如前所述，在与岁数较大的人交往中，上海年轻人更可能与邻居认同而不与父母认同；他们不但不与父母使用相同的语言特征，而且还会对父母使用的语言特征产生抵触。因此，使用“我”字新音的年轻人很可能不使用父母所发的原有音。相比之下，岁数较大的邻居所使用的原有发音或许就是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的唯一语音“样本”。在老式的上海住房中，特别是有合用厨房、卫生间、庭院等公用设施的住房，邻居之间来往较密切。不过，在上海的现代化公寓住宅中，邻居之间很少来往、交谈，互相之间很可能不认识，更不要说形成什么密切的关系。好奇的人在听到走道上有人经过时或许会透过门上的“猫眼”看看外面是什么人，但邻居相遇时

互相之间很可能视而不见。人们的手机上存有两、三百个电话号码很常见，不过可能其中没有一个是邻居的。因此，上海的年轻人如果不与岁数较大的邻居接触，就缺乏与上海方言中“我”字原有发音 [ŋu:] 的接触，也就没有机会学会发这个音，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新发音在上海方言中的采用。

六、结论

由此可见，上海方言中“我”字的新发音 [u:] 是一个由身份认同所推动的语言变化。身份认同在其中似乎起了一种过滤作用，有选择地将非本地人使用的一个语言特征引介到上海方言中并由上海方言的本地使用者所采纳。过去，上海本地人不愿意与将“我”字发成 [u:] 的人认同，所以这个新发音一直没有被采纳；它只是作为一种发音变体而存在。最近，上海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与将“我”字发成 [u:] 的人认同并使用这个新发音，从而启动了上海方言中的这个音变过程。

References

- Aitchison, J. 2001.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mbers, J. K. 2001. “Patterns of variation including change”. In Chambers, J.K., P. Trudgill, and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Chen, M. & Wang, W.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 255-81.
- Comrie, B. 1981. "On the go/went alterna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tive phonology of English". In T. Ernest and E. Smith (eds.) *Lingua fran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Croft, W. 1995. *Autonomy and 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 *Language* 7: 490-532.
- Cukor-Avila, P. 2000. *Th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Vernacular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MS.
- Kiparsky, P. 1988. "Phonological change". In F. J. Newmeyer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Vol. 1: Linguistic theory: found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iu, G. 2007. "A Sound Variation or a Sound Change in Shanghai Dialect?", *Chinese Studies Review*, Vol. 2.
- Milroy, Lesley. 2002. "Social Networks". In Chambers, J.K., P. Trudgill, and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Moravcsik, E. A. 1978. "Verb borrowing". In 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ume 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meyer, F. J. 2003. "Formal and functional motivation for language change". In Raymond, H.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jfel, H. (ed.) 1982.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 G. 2003. "Contact as a source of language change". In Joseph, B. D. and Janda, R. D.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alden, Mass.: Blackwell.
- Thomason, S. G and Kaufman, T.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urner, J., Hogg, M. [et al.]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van Coetsem, F. 1988.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Dordrecht and Providence: Foris.
- 钱乃荣, 2003, 《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市统计局, 2007年, <http://www.stats-sh.gov.cn/2007shtj/shgl/rkjy/rkky.htm>